

# 后分析历史哲学与 历史知识客观性的重建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一个新趋向

□ 顾晓伟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5

新世纪以来,在关于西方历史哲学或史学理论向何处去的持续论争中,埃泽尔·塔克在《史学哲学的未来》一文中,用数据展示了过去几十年来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状况,从而提出他的对策:“历史哲学的根本问题应紧紧抓住仔细而严格地分析史学实践,以及吸收认识论、科学哲学和法律哲学的最新成就。”我们将会看到,塔克在后分析历史哲学的立场上给出了不同于叙述主义历史哲学的解决方案,其中他借用的重要资源,就是上述讨论的逻辑实用主义者蒯因的整体论和自然化的认识论,以及在墨菲、戈德斯坦等人的研究基础上,来探讨和深化被叙述主义者忽略的历史证据及其历史认识论问题。

首先,塔克反对分析的历史哲学家关于历史事实的教条观点:“沃尔什的科学观点如同他的史学观一样是靠不住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们不像农民从树上摘葡萄一样摘取事实,因为并没有给定的、准备好供科学家或史学家选择的科学或史学事实。如果我们把事实看作是几乎完全确定的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那么,有关事实的知识就是研究框架的结果,事实是负载理论的。这是因为,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所认定的事实取决于他们的理论、研究计划和证据的约束。”塔克在此批驳了沃尔什所依据的逻辑实证主义还原论教条,从而认为历史事实跟科学事实一样,都是理论选择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不可观察的。塔克跟叙述主义者在反基础主义这个立场上是在站在同一阵营的,都没有拒斥历史的形而上学问题。但是,在采取何种历史的形而上学,以及要不要抛弃认识论这两个问题上,塔克跟叙述主义者出现了分叉。与叙述主义者将史学与陈旧的科学哲学对立起来不同,塔克则重新将史学与最新的科学哲学对应起来,“历史与史学的差异如同自然与科学的关系。科学哲学研究科学以及科学与证据之间的关系,它不能完全直接研究自然,它否则就成了科学。同样,科学史学研究通过证据性的遗留物来研究历史。史学哲学研究我们有关历史知识的认识

论,以及史学与证据的关系”。我们就此可以看出,塔克所展现的后分析历史哲学的路径与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一些本质性的差异和张力。

其次,在分析塔克与叙述主义者的异同之后,我们具体来看,他是如何探讨历史的形而上学和史学的认识论问题的。就如蒯因的本体论承诺一样,他并没有拒绝历史的形而上学问题,而是将其放在了史学哲学的认识论中来加以讨论。不难看出,塔克给出的这个史家实际操作的模型非常类似于亨佩尔“覆盖率模式”的进化改良版,也更加细致和准确地描述了历史学家的实际工作。特别是他借助于统计学和计量史学中常用的“贝叶斯定理”,从而将史学简化为一种信息的推理和计算,由此也顺应了大数据时代史学进一步科学化的诉求。

正是在反对历史怀疑主义和隐微主义过程中,塔克提出“信念共识”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才成为历史知识的指示器:(1)非强制的信念共识;(2)独特异质的信念共识;(3)足够广泛的信念共识。这些信念共识不是绝对主义的,而是可以自由选择,同样,信念共识也是不断变化的。就第二点来说,“我在此提出的可选择途径,既不是必须依赖于权威,也不必要求普遍的共识。它仅仅需要独特的、非强制的异质性;如果有人不认同一套信念没有关系,只要人们彼此具有足够的差异性来拒斥知识假设的其他替代假设,同时,持不同意见的人能够一致支持用特殊的倾向来解释其不同意见的假设即可”。比如说,不信教的,信教的,信仰不同教的人,可以就达尔文的进化论达成共识,但他们都具有异质性。在塔克看来,这仍能保证历史知识的客观性,“一旦历史学家接受了认识价值的客观性,主体间共识的获得就成了史学知识客观性这一重要目标的标志”。塔克很少像罗蒂那样,反反复复地强调自己的新实用主义身份,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他使用知识社会学中的“史学共识”这个概念来替代传统形而上学

或认识论上的客观性概念,恰好就具有鲜明的新实用主义特征。他在《事件的整体论解释》一文的结论中明确给出了这一观点,“对于描述事件之解释的整体论分析是实用主义的。……其优势是:它能够避开许多已论证的有关覆盖率模式的缺陷,与此同时,它适合科学家、历史学家和日常人们解释描述性事件的实际应用”。

我们最后来看史学理论新秀库卡内在后分析历史哲学这个进路上的工作。与戈尔曼和塔克类似,库卡内的历史哲学明显也具有后分析历史哲学的特征。不过,从《后叙述主义史学哲学》书名可以看出,他主要在叙述主义的遗产上来获得分析的历史哲学的新突破。“此书观点认为史学是理性实践的一种形式。……此书试图建立这样一种路径:反对绝对主义的真值函数标准,取而代之的是没有隐含任何绝对正确解释之带有认知公信力的合理估价。”在此书的前半部分,库卡内重点论述和总结了叙述主义历史哲学克服和超越分析的历史哲学过程中所体现的三个洞见和信条:(1)表现主义;(2)构造主义;(3)整体论。比如,在对海登·怀特和安克斯密特的历史表现理论进行总结和批判的过程中,库卡内借助于诸多实用主义导向的科学哲学家的观点,从而提出了一个非表现主义的路径,“它能够促使我们从刚性的主体—客体二分中解放出来,去寻找明确的和确定的史学构造是关于什么的对象。……通过严格的表现主义的图式来获得史学的意义是误导的,这只会更加远离这一核心观察:解释天生是推论性的和建构的”。这也即是说,不管历史表现是历史实在的复制或拷贝,还是关于历史实在的替代和置换,其中都预设着主体—客体二分的前提,这也正是戴维森所批判的“概念图式”的教条。

在此书的后半部分,库卡内进一步借鉴匹兹堡学派代表人物布兰顿的推理主义,即知识作为一种语言实践是给出理由与征询理由的游戏,从而将海登·怀特和安克斯密特的表现主义返回到最初沃尔什提出的“总括性概念”,认为作为综合的史学推理是一种“施为的论证行动”,“根据布兰顿的观点,这一种类的推理承诺蕴含着宽泛的规范性运用,以此来获得断言的公信力。……断言是一种带有规范性的社会实践,它授权特定种类的推理,以及要求断言者有责任给出某一断言的理由。……给出理由的推理实践本身也是证成的一种形式”。在这里,库卡内跟戈尔曼、塔克一样,也将典型性、可理解性、原创性等一些认知价值或知识德性引入到史学推理之中,提出史学证成的三方理论,包括认识论的层面、修辞的层面和推理的层面。由此可见,库卡内就将历史知识的客观性转换成了合理论证和证成的过程,“主观的特质是通过转换到主体间的评估和批

评而得到拆解,以及通过一些特定的评价标准所限定”。在他看来,历史学家的共同体犹如理性的协商共识社会,“史学解释的‘社会’层面使得史家超越了个体性,由此而承担规范性的要求”。库卡内明确反对詹金斯和蒙斯洛的个人主义的主观主义,而赞成一种集体主义的主观主义。史学作为一种社会或学术批判的话语,史学解释总是要负载价值的,而这个认识价值或知识德性就是史学推理语境的社会规范。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尝试总结后分析的历史哲学的一些特征。其一,后分析的历史哲学是在继承分析的历史哲学的一些品格而获得新发展的。这使得后分析的历史哲学与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产生了基本的张力,前者更倾向于继续保持与科学哲学的亲密关联,而后者则更加注重与文化哲学或文学理论的亲缘关系。这种对立和背向而行,可以看作是古老“历史学是一门科学还是艺术”论争的延续,也可以看作是科学(自然)主义与人文(历史)主义之间论争的继续,同时也可以看作是盎格鲁—撒克逊经验论传统与欧陆唯理论传统之间的隐晦对话。

其二,后分析的历史哲学是在批判和克服分析的历史哲学所预设的逻辑实证主义而获得新突破的,借助的资源就是蒯因、戴维森、库恩、罗蒂、布兰顿等新实用主者的成就。正如罗蒂所言,“实用主义在美国哲学中的复兴,或者说新实用主义哲学在美国的兴起,主要是由于实证主义的分析哲学走到了尽头”。作为后分析哲学的分支学科或者说消费者,后分析的历史哲学也具有不可抹去的新实用主义印记。

其三,在围攻逻辑实证主义的战役中,后分析历史哲学与叙述主义历史哲学达成了一些共识,尽管他们各自的出发点并不一致。比如,他们通过对基础主义和历史实在论的批判,从而提倡一种历史知识的构造理论;与此同时,跟蒯因的整体论异曲同工,叙述主义者将历史文本作为一个整体的话语结构来看待,也就克服了分析派原子陈述语句的还原论教条。

其四,与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不同,后分析的历史哲学仍旧坚持分析的历史哲学的科学(自然)主义立场,反对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提倡“怎样都行”的极端化立场。他们将历史证据和历史认识论问题重新纳入作为一门学科的史学的范畴加以探讨;与此同时,他们对于分析的历史哲学的改造也更为彻底,比如说,叙述主义者所预设的概念与内容的二元论、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对立等一些教条,在他们那里统统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实用主义的态度。

■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4期,约22000字